



齐平



周竞

革命伴侣献丹心

高燕

在太原解放纪念馆里,陈列着太岳军区地下情报站长齐平、政委周竞夫妇的遗照,以及他们曾经使用过的梳妆台和电子收音机等遗物,他们的英勇事迹,永载史册。

1942年秋,太岳军区司令部情报处派齐平、周竞夫妇进入太原,开设情报站,秘密开展工作。

他们搜集了阎军特务组织、军事系统以及特警处各组织的全部人员名单,由周竞负责整理保管,经过秘密处理后,巧妙地转送出去。

全国形势好转了,他们的工作环境却更加险恶。敌人在战场上屡战屡败,加上叛徒出卖,特务头子梁化之开始怀疑齐平和周竞。夫妇俩察觉到有人跟踪和监视,太岳军区党委要他们早做转移的准备。虽深知处境危急,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但为了党的事业,他们把个人



齐平、周竞夫妇使用过的梳妆台

生死置之度外,继续留在敌营。

1947年10月16日,敌人抓走了他们夫妇俩。特警处当夜审问,他们宁死不屈。气急败坏的敌人在特务机关的大礼堂内,召开了紧急会议。整个会场杀气腾腾,副处长徐端主持会议,宣布了齐平的“罪行”。齐平被五花大绑,脖子上还套着一根绳子,但他仍昂首挺胸,正气凛然。之后,几名敌人紧紧勒住齐平脖子上的绳子……齐平同志壮烈牺牲在会场上。特警处的阴谋彻底失败,他们什么情报都没得到。

从齐平那里得不到的东西,敌人妄图从周竞身上打开缺口。他们以为周竞是女人,又那样文静、娴淑,还带着两岁多的女儿,容易就范,逼迫她交代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徐端多次亲自审讯,并隐瞒了齐平牺牲的事实,劝降说:“只要你交出共产党的秘密,就能保全你夫妇二人的性命。”周竞或以沉默相对,或者干脆利落地说:“不知道。”

狱中的条件十分恶劣,周竞还带着个吃奶的孩子,看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孩子,听着她的哭叫,周竞心如刀绞。徐端看周竞难以争取,在最后一次审讯时,以年幼女儿的性命来要挟,周竞愤怒地说:“你休想让我出卖同志,要杀就杀,任凭处置!”经过几番严刑拷打,特务们失望了,当着女儿的面将周竞残忍杀害。牺牲时,齐平32岁,周竞31岁。

齐平、周竞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洒下满腔热血,献出一片丹心,他们夫妻二人的卓越功勋和英勇事迹,以及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信念、气节,永远激励着后人……

东魏程哲造像碑

姚香

东魏程哲碑又称为《赠代郡太守程哲碑》,镌刻于北朝时期东魏天平元年(534),原立于长治市袁家漏村。清光绪年间被发现,现藏于山西博物院。碑身通高143厘米,碑身四面镌刻。

造像碑正面开一圆拱形佛龛,高50厘米,宽39厘米,深9厘米,佛龛两侧线刻立柱,上部刻尖拱龛楣。龛中佛像高47厘米,结跏趺坐于方座之上,面形长圆,素面高肉髻,内着僧祇支,胸前束带作结,外披双领下垂袈裟,袈裟下摆覆于座前,衣褶略呈“八”字形展开,袈裟衣纹多用平行的阴线所刻。

佛身后用阴线刻头光、背光,身侧左右各有阴线刻胁侍弟子,均有头光,造型简洁。龛外线刻满壁,左右胁侍菩萨各一,有桃尖形头光,头戴花冠,身着长裙。龛上部刻祥云及火焰纹,其间左右各一飞天,体态飘逸,线条流畅。

佛龛下部正中刻四人供养图,分为两组,每组二人,前低后高。前为老者对坐,手执莲蕾,着长袍,跏坐,无发,二人身后各有

一持伞盖侍者。供养图正中有两行刻铭,字迹大多模糊不清。四人供养图两侧各蹲一长毛猛兽,似张口欲吼,形态应为狮子。

碑两侧均刻有祥云及飞天纹饰,与正面纹饰相连接。很明显,这是一通典型的佛教造像碑,是当时社会上佛教盛行的具体反映。

与正面的开龛造像不同,程哲碑背面碑头刻“大魏天平元年岁次甲寅十一月庚辰朔二日壬午造讫”。其下刻文小楷,碑文总计1404字,详细记述了程哲及其同族中显赫人物生平,既是发愿文,也是一篇墓志铭。

碑阳的佛教主题与碑阴铭内容的巨大反差让人疑窦丛生,这恰恰就是程哲碑最具特色的地方和它的价值所在。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生死,“事死如事生”是中国人的丧葬习俗,墓碑中出现佛教造像题材,说明死者生前已然虔诚信奉佛教,希望死后他信奉的宗教神祇能够给他带来彼岸世界的平安和幸福。传统汉文化和来自古印度的佛教文化在同一通碑上完美的并存、融合,正体现出南北朝时期文化大融合的历史风貌。

北朝的500余年间,被称为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在历经北魏统一、东西魏与北齐、北周的分裂,政权交替混乱,使得佛教有了充分发展的社会条件。尤其是北魏定都平城时(今山西大同),北魏诸帝,除废黜佛法的太武帝外,都笃信佛教,大量僧侣从凉州及世界各地涌入平城,使其成为佛教中心。

当皇家大规模的开窟造像成为北魏佛教造像风格主导的同时,民间信士们为了单独供养及移运便利,除了铸造为数甚多的金铜佛像和单体石雕像之外,另一种具有民族传统的佛教造像艺术载体——造像碑,则在民间悄然兴起,成为民间佛教造像的主流。

民间造像从其保存状况的完整性、系统性与工艺的精湛方面来说,虽不能与石窟造像相媲美,但民间造像对于时代风格的敏感以及凿刻内容的随意性、多样性却是皇家造像无法匹敌的。



程哲造像碑(山西博物院藏)

食品街下出“青花”

曹俊

2012年8月,在太原市食品街改造建设工地上,出土了一批元明清瓷器残片,经研究考证,这批瓷器与明代晋王府有关。

这批瓷器,以碗、盘、碟、瓶、罐等日用瓷为主,包括磁州窑、山西诸窑以及景德镇窑等地产品。从釉色上看,以青花瓷的出土数量最多,另有五彩、粉彩、白釉黑褐彩、白釉、黑釉、茶叶末釉、孔雀蓝釉瓷等。后来,又在食品街和钟楼街交叉口东、唱经楼对面的建设工地上,采集到一批与明代晋王府有关的瓷器,其中有一些带款识的器物,系晋王府瓷器遗物。

这批瓷器共9件,其中包括1个花口杯、2个盘子、6只碗,皆为青花瓷,纹饰采用双勾填彩技法描绘,青花发色蓝艳泛紫,层次分明。出土时器物破损严重,后经清理拼对、粘接,复原了5件,另有4件仅存底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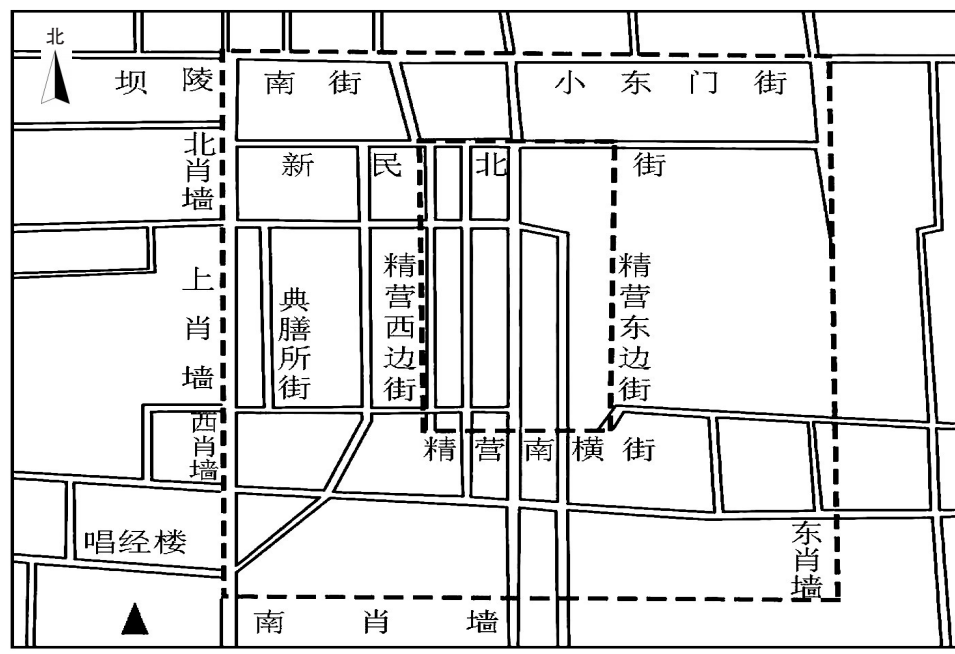
花口杯胎体坚薄,胎质细腻,釉色较白,釉面光洁,器壁内外用青花满绘纹饰,外壁绘四组主题纹饰“对鹿纹”,一只昂首奔跑,一只回首顾盼,前呼后应,相应成趣。鹿身以细线勾勒,点染装饰,辅以竹石花草,使鹿的形象更加凸显。内壁口沿至腹上部绘龙三条,龙作侧身状,头朝右,顺时针依次排列,间以火焰纹。龙纹形象为昂首,束发,张口,翘舌,怒目,轮状五爪,身布齿形龙鳞,细身,外底双蓝圈圈内,青花书写“晋府官用”四字双行楷书款,字体规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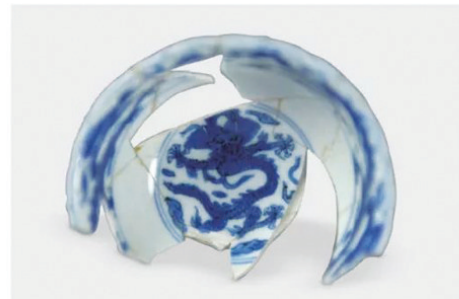
青花“典膳所造”款龙纹碗



青花“内膳所造”款龙纹碗



瓷器出土地及与晋王府遗址位置关系图(作者绘)



青花“晋府官用”款八开光外鹿纹内龙纹花口杯全景图

青花龙纹盘内外壁绘五爪龙纹,外壁为侧身龙,内底为正面龙,周围散布带状云纹,弦纹作边饰。白胎坚薄致密,釉面洁白。外底双蓝圈圈内用青花书写“典膳所造”四字双行楷书款,字体规整。

青花龙纹碗纹饰都很精美。其中一只釉色微青,平整光洁,外壁周身绘有两条穿云戏珠龙纹,侧身,昂首,束发后扬,怒目圆睁,作咆哮状,轮状五爪,齿形鳞片,有腿毛,周身满布带状云纹。内壁近口沿处绘缠枝花卉纹一周,内底绘正面龙纹,形象同鹿纹花口杯。外底双蓝圈圈内书青花“内膳所造”四字双行楷书款,字体有力,较为规整。

这批瓷器皆为采集品,因层位关系不明,故考古人员运用类型学的方法,综合器物的胎釉、青花发色、绘画技法、造型和纹饰等特征,对其窑口、时代等进行考证。从器物的胎釉特征看,当为江西景德镇窑产品;从青花发色、绘画技法、造型和纹饰等特征看,具有典型的晚明时期特点。

花口杯从器型、纹样布局等方面,颇有万历时外销瓷的风格特征,尤其是鹿纹图案在外销瓷中更为常见。在万历圣地亚哥号沉船出水的外销瓷杯、盘等器物上,前呼后应的“对鹿纹”图案十分多见,其中出水的青花八开光鹿纹花口杯与此次出土的花口杯特征基本一致。

太原食品街所出龙纹碗,无论从器型还是龙纹形象,同河南开封周王府所出青花龙

纹碗几乎完全一致,正面龙纹的形象同1958年江西南城县万历十九年(1591)明代益庄王朱厚焯夫妇合葬墓所出“大明嘉靖年制”青花龙纹盘纹饰类似。侧身龙纹的形象可参考2005年湖北省武汉市四望镇田应祖村出土的“大明万历年制”青花龙纹碗以及景德镇陶瓷馆藏“万历年德府造”青花龙纹碗。器型和纹饰风格类似的器物,在万历沉船南澳1号、圣赫勒拿岛白狮号以及崇祯沉船南中国海哈彻号等出水的器物中也有发现。

这批器物的款识特征明显,皆以青花书写,四字楷书,大多书写有力,结构健美,笔粗色浓,颇有官款风格,或出自同一匠人之手。器物属性上,太原食品街出土的这批带款器物,除“菊溪府地望”待考外,均为明代晋王府定烧瓷。

地方官府定烧的瓷器,在宋代或已出现,但未见实物。进入明清,各地王府在景德镇定烧瓷器更为盛行。明代中期,特别是嘉靖之后,官窑制瓷没落,优质制瓷原料流入民间,使得民窑产品质量大幅提高。加之嘉靖、万历时期实行的“官搭民烧”政策,部分民窑产品质量甚至超越了官窑,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清代初期。因此,明代晚期民窑能够烧制出级别较高的王府用瓷,也在情理之中。

明代晋王府,在明代诸王府中,规模宏大,建制较早,成为后来诸王宫城建设的标准,其布局也凸显了明代王府建筑群类繁多、分区严格、突出礼制的特点。顺治三年(1646)四月十二日夜,晋王府毁于大火。如今,太原城内还留存有大量与明晋王府相关的遗迹以及街名。

典膳所,是明晋王府管理膳食的地方,位于王府宫城西侧,现沿用为典膳所街。“内膳所造”款,意为供内膳使用所烧造。从史料记载可知,“内膳”是帝王后官所享用食物的特称,不同时期隶属不同的机构管理。

瓷器出土地点,位于明晋王府遗址外城西南约150余米,两处相隔不远。该区域地层堆积丰富,这批器物埋藏位置距地表约3米,出土时多破碎缺失,堆积中还有建筑构件、陶片及其他生活用器等遗物共存,可能为当时晋王府填埋生活废弃物的一处灰坑。

这批器物的表面皆有铜钉孔痕,表明它们曾经过多次修补,一些铜孔内残留铜钉,从锈蚀情况来看,当时采用的是铁质铜钉,孔眼规整,反映了当时制瓷工艺的高超和使用的普遍性。

综上所述,太原出土的这批瓷器遗物,应为明代晚期万历至崇祯时期,晋王府在景德镇定制的具有官用性质的民间窑场烧造的高档瓷器。这批瓷器的出土,填补了瓷器款识研究上的空白,对研究明代晚期景德镇的制瓷手工业,明代晋王府的兴衰历史以及陶瓷工艺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乍册虎”玉琮的历史密码

王瑞华

山西晋国博物馆藏品丰富,其中一件“乍册虎”玉琮弥足珍贵。这件玉琮属新石器时代晚期,铭文为商周时期刻。

“乍册虎”玉琮,通高4.9厘米,内径宽3.8厘米,清白料,玉质偏黄,上、下射边缘有黑褐色沁斑,器身有裂。整体瘦长,光素无纹,正面刻“乍册虎”三字铭文;内圆外方,有上下对穿的圆孔;器表光泽规整,厚薄均匀;边角端正,射较高。2021年9月,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华夏之华——山西古代文明精粹”特展中,“乍册虎”玉琮与晋侯墓地出土的鸟尊等文物同堂展出,成为华夏文明一脉相承的又一见证。

玉琮是一种古代礼器,为内圆外方的筒型,象征着天圆地方。因天是圆的,又显苍色(青色)之故,故以苍璧祭天;地为黄色而方,故以黄琮祭地。

玉琮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见于东南地区的太湖流域到杭州湾的良渚文化,其后

向西北发展,在黄河流域大放异彩。“乍册虎”这类玉琮,在石峁文化、齐家文化、陶寺文化、清凉寺墓地等多处均有发现。

“乍(乍)册”为商周时期的官职,“虎”则是这位官员的名字。“作册”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武丁时期,《甲骨文合集》中的268片和《战后京津新获甲骨录》中的703片均刻有“作册”二字。1977年在甘肃庆阳发现了一件“乍册吾”玉戈,是现今已知最早刻有“乍册”铭文的器物,其形制、大小、风格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戈相似,从而推断其时代为殷武丁时期。

在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中开始多见“作册X”之称谓,如作册封鬲有“作册封”、令簋有“作册矢”、作册吴盃有“作册吴”等铭文,迄今为止,所知“作册”器有60余件。据王国维考,



“乍册虎”玉琮

西周时,“作册”也称“作册内史”“作命内史”,其主要职责为掌管国家的图籍档案、奉行王之诰命、参加重大祭祀活动、负责迎接并安置前来朝见的诸侯使臣等。

商周时期,以“虎”为名比较常见,寓意像虎一样勇猛和威武。显然,“作册虎”是一位商周时期名为“虎”的史官。这件玉琮,由于某种原因辗转到了作册内史“虎”的手中,于是他将自己的官名刻于其上。

文物静默无声,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这件传承了几千年的“乍册虎”玉琮,折射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